

請真雜誌

再生



659

日十二月九年七卅 刊 週 期二三二第

社 言
財經緊急處分向前看

新幣制成敗關鍵何在？

我國對外貿易之重大使命
與政府應有措施

洩幣獄與王雲五徐百齊之官運

鄉建重點與鄉建難關

滄桑明眼錄

· 蔣勻田 ·

· 張肖梅 ·
· 楊博如 ·

· 黃河清 ·

· 申 銘 ·

· 秦 越 ·

論元代覆亡之速

· 訥庵 ·

附 錄
論幣制改革

喻益邨 孟憲章 方建民 呂克雉
莊湘波 陳述昆 金柏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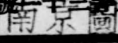
社會問題座談會

行發社版出生再

(角壹圓金價售期本)

(版出一期星逢每)

號一十三零九四七路園鼎海上



社言 財經緊急處分向前看

我們於全國財經改革的緊急處分令宣布以後，曾檢討過經濟改革，端賴政治澄清；動儉建國，當自政府和財富之家作起。這樣所謂財經改革，才能名符其實，改革條已匝月，在素有「告示爛，官事散。」的觀念的人民，或有些「不過如此」之感，我們對於這次改革的看法，却認為如能名符其實，則含有絕對重大之意義，欲求其不消極而治本，不以「緊急」二字作驚人之筆，而一循常軌，逐步開展，我們願作進一步的探討。

本年七月底八月初，全國經濟金融狀況，因通貨之膨脹、物價之奔騰，引起不肖官商變本加厲的勾結操縱，整個人民生活，陷於疾風暴雨之中，政府斷然有此一緊急措置，實為應付危機之轉捩。雖然考慮多日，始行發表，但其不公平不周密之處，則執行愈久，發現愈多。政府名為緊急處分，正有其水來土掩之臨時性質，現在立法院第二會期已屆，政府自當將已付施行之方案，咨請追認，立法院諸委員繼續第一會期之準直精神，上實行以後的見聞經驗，必可有一番精細的研究和鋒利的批判，其能彌補政府施政人士的智力所不及之處甚多，但我們以為財經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此次政府所已公布之方案，實可謂枝幹粗疎，略具輪廓，至於怎樣鉤勒嚴密，還需要多少細則補充；怎樣能符合公平、有效、和持久三大原則，全賴集思廣益。政府應在立法院會期，陸續咨送，徵求意見，比如在立法院第一會期一再指摘的豪門資本，此時財經改革，怎樣能制裁有效，即為一最大的中心問題。政府尊重法治與民意，當然不能似行憲之前那樣譁疾惡聲，而制我豪門若照八月二十日所頒布那幾條辦法，恐立委諸君未必輕信其有效。談改革不議及豪門之顯著的制裁，則改革終不免是「今夕祇可談風月」而已。我們尊重立委諸君之選見，相信於此點不會放鬆的。其次如上次會期草通過的軍費預算，如今不提動儉建國則已，若提此事，請問國家開支最為浩繁的軍費可曾包括在內？公務員不注重質的提高，而祇為怕失業人多，維持軍的龐大，也是否包括在節約計劃之內？蔣總統一向倡導「一個人作兩個人事，兩個人吃一個人飯」。我們十分贊同，試問對於正雅番號的幾百萬軍隊，是否真能裁汰老弱，核實名額？混跡在公務和國營機關裡的貪污低能，是否都能破除情面，大批淘汰？政府提倡動儉，恐怕很容易忘了自己也是對象，必須立法院督促提醒，我們尊重立委諸君之認真，對於已經通過的政費和軍費，想不致於「放乎中流，聽其所之」。

再進一層說：我們以為蔣經國在本月十二日對青年軍的演辭，不是謙虛，乃是老實話。蔣經國不願自身成英雄，而願五百萬市民站起來。中國革命，推翻滿清近四十年，國民黨統治全國二十多年，到現在才出一位蔣經國替人民捕捉幾頭惡虎，則過去這多年，政府當局、地方長官、是否皆在養虎為患，抑是為虎作倀，令人不勝驚慨。不過人民良憤無告者多，貪官奸商隨處皆有，蔣經國一人之耳目有限，權力所能達之空間更有限，比如說他能「打虎」，中國俗語道：「東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他站在東山的一石片崖，又豈顧得了西山的千幾萬羣？所以我們把他一個人傳奇化是無用的，而僅僅著眼在消滅「除害」，即使殺一做百，也只能亂亂一時；何況上海以外，各地物價皆在飛騰。千萬隻大虎，把牠一亡、或隱蔽、甚或幻為人形，偽充善類，已落網的會不放大罪化小，小罪化無，還很難說。我們以為此次財經改革如本着積極的意義，向一條世界趨勢必走的大道上去，其有助於中國復興之功多多。怎樣使人民都花得起金圓來維持合理的生活？怎樣使勞動生產階級，免於不勞動、不生產的寄生階級的剝削？怎樣使國家行政不被貪官和特權階級玷污？怎樣使政府官吏真能成為人民的公僕？如果有一個光明而透澈的財政經濟大改革，擴大以至眞的社會革命運動，肅清政府與社會裡的濫派，是一個先決的條件，但其成功在於蕩蕩濼濼以後，不再容許有新豪門、新特權、新貪污的遺魂，以至目前人為的非制度的、一域的而非普遍的改革，人民又焉能有長久的安全感？

與其問「上海往何處去？」不如問「中國往何處去？」政府此番既將「從事這一艱巨而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工作」，讓我們拭目以看是否將有一個劃時代的改變。果然政府有決心引導一個有計劃的「革命運動」，以消滅全國一切經濟不平等的現象，要人民用最大的力量和出最大的代價不難；因政府和社會有力人士的澈底覺悟與合作，整個力量去修復經濟殘破，消除社會不平，我們確信人民並不好亂，更不會有亂需要談。

新幣制成敗關鍵何在？

· 蔣 勻 田 ·

我們一向對幣制改革，都持慎謹的態度，認為必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一、生產與消費平衡。二、收入與支出平衡。三、出口與進口平衡。始可下手，而望其有成。但現在政府既以雷霆萬鈞的魄力，迅雷不及掩耳的勢態實行幣制改革，我們却願全力擁護，渴求其成功。在此心理狀態之下，我們願意贊美政府此次改革幣制的決心，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在金鈔存量遠遜於前時的條件下，能夠為嚴重的經濟問題，找出一把解決的鎖鑰，確非易事。我們也願對各方提出的責難質詢，依據我們所瞭解的學理，予以解答。更願意參照此次戰後，各國改革幣制的經驗，提出我們的意見，幸冀政府採納，而有助於此次改制的成功。

在幣制改革的消息初達民間，各地市場雖曾一度起過騷動，但時至今日，除却廣州因港幣行情的變動，而影響物價飛漲一倍之外，其他各大城市，雖亦因大戶的觀望，物價都不免稍有變動，未能確切凍結於八月十九日之水準上，一般說來，尚稱平靜。可說幣制改革的開端，已得人民的擁護。以後的演變：其為順轉，抑為逆轉，及其速率之快慢，原因固多，而政府以金圓券為支付工具，能否精製掣節，實為主因之一。換句話說，改革之前，即未能備備三大平衡基礎，改革之後，必須首先作到收支平衡。政府一切開支，包括軍費在內，必須從稅收、國營事業之收益或內外公債中支付，切不可再以印刷機為彌縫赤字之妙法。祇要能作到這一點，則金圓券的前途，必可樂觀，物價自有漸趨穩定之可能。物價能有穩定之趨向，中央銀行能善用利率政策，導游資於生產的正軌，再加以友邦的援助，則生產與消費的平衡，亦不難作到。隨之而出進口的平衡，更易為力；縱使一時不能平衡，祇要進口貨多限於生產工具，仍不失為經濟復興之象徵。我始終願為此樂觀想法。極希望能如此實現。

改革方案公布以還，首先受批評的是新舊幣的兌換沒有照人民財富的多寡而予以差別待遇。北平的周作仁教授說：「這次改革幣制沒有一點打

倒豪門的跡象」。八月二十一日南京教授座談會也說：維持特權階級的特殊利益，殊失改革幣的真意」。八月二十三日上海大公報登載「翁內閣王牌攤出了」一文，其作者又指出，「沒有差別貧富的待遇是文字第一號的缺點」。此外，「時與文」等雜誌對此也加指摘。這些論調都是受蘇聯的影響而發的。去歲蘇聯實行幣制改革時，新舊幣的兌換率是照銀行存款多寡而有差別待遇的。這辦法本身確有深長的社會主義意味，我們當然贊同。不過，以我們目前國家的本質來說，以我們還沒有完成國民財富調查這一點來說，再加上我國一般人多無存款於銀行的習慣，一時要學蘇聯的榜樣，行起來恐怕不但失去這辦法原來的意義，且會釀成更多的困難，是可想像得到的事。而且，這次改革幣制其目的與其說是平均社會財富，毋寧說是求物價的穩定。平均社會財富似應假手於其他的方法。其次，翁內閣王牌攤出了」的作者又指出，以黃金白銀外幣及銀元兌換金圓券時，前三者所得，較持有銀元者所得為多，而認為是為有利於有產階級而不利於中下層人民。關於此事，八月二十六日大公報登載了「釋金圓券中的數字」一文，作者盛慕傑氏在其中有很好的解釋，我們同意此種解釋。讀者可以參閱。筆者不願略人之美。在五卷一期的「觀察」雜誌上，樊弘教授有「金圓券能够穩定物價嗎？」的大文。其中他強調了「金圓券的發行是絕對對不着準備的」，又說將黃金白銀外匯存於中央銀行內「根本沒有用」而且是一個「幌子」罷了，拿寶貴的東西作「幌子」是由「急用化為無用」的「資源的濫費」。按現在各國對貨幣的處理是着重管理而不着重準備，但這並非說準備對於幣值的穩定沒有一點幫助。照各國目前情形來說，實行新金本位制的國家其貨幣雖停止兌換，但還是有相當準備的。有準備的發行有一很大的優點，即政府發鈔受有限制，故不易發生通貨膨脹現象。反對者說民國二十四年改制的法幣，其準備金高於現在的金圓券，但仍不免於膨脹，可知準備實不可靠。但須知法幣發行後，確因有百分之六十的現金

準備，而一時信用卓著。其後雖不免於膨脹，其過不在其有準備，而在政府因對外戰爭，不能遵守發行的規定有以致之。我在「再生」二二八期發表「幣制改革與中國當前經濟問題」一文中，亦曾提出貨幣應以國民生產力為準備的觀念，當然不認為金圓券有了準備，就可永遠消滅其膨脹的可能性，但確相信，有了準備第一可以示信於人民，其次可以給予政府以發行上的限制，即是說政府既經公布其發行最高總額與其準備的比例，便不好任意增加發行，總有點顧忌。至於政府是否會被破壞發行的規定，那是本題以外的話。我們是生產落後的國家，通貨管理，特別困難。且人民對於法幣既有不良的印象，所以金圓券有充足的準備，是政府必須的昭告與措施。他如蔣基傑先生說最高發行限額必將失敗；又有入從財政收支和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上判斷新幣必將失敗。各種批評，固皆言之有故，持之成理。然皆係從悲觀方面着想的論調。照今日的局面，國內與國際收支之平衡，勢不可能，而法幣已失其為貨幣的功能。變固未必即通，而窮則實不能不變。變或幸而能通，誠國家之大幸。我以為為核心問題，乃在變後如何使其平衡。亦惟有變後，在暫刻穩定的當兒，才有求得平衡之契機。假定能得到平衡，則最高發行限額必不至失敗。所以我們的看，法成功或失敗，繫於變後的措施，不願即作斷定。而願舉出近年來各國改革幣制之前例，察其成敗之關鍵，以為吾人之殷鑒，或更愈於悲觀的批評。

戰爭結束後，歐洲大陸國家的通貨膨脹，都演進到嚴重的程度，其急待穩定的企圖，不能借助於基金之籌足而完成；不得不用政治的力量來進行穩定貨幣的嘗試，其方法大抵基本上都是一樣：或者用財產稅的方式，或者用強迫公債的方式，或者兩種方式同時並用，即是從持券人手裡拿去一部分鈔票，以減縮流通中的鈔票的大部分。比利時即是用此法以整理幣值者，結果銀行鈔票的流通量仍舊如下的增加起來：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五年
100	100	100	100	100
(年)	(底)	(底)	(底)	(底)

(單位十億佛郎)

法國的貨幣改革，把流通中的鈔票總數從五千四百九十億佛郎，減少到四千四百四十億佛郎，而到一九四六年一月，此種總數，又重新增加到

五千九百二十億佛郎。希臘的「特拉瑪」的貶值達到破產的程度，較之我國法幣貶值尤為慘烈。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企圖穩定特拉瑪的計劃下，以一個新特拉瑪兌換五百億舊特瑪，但其在經濟上既弄到枯竭的程度，在政治上又極不安定，所以穩定的目的，即在短期內也不易達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新特拉瑪的貶值，已呈一瀉而不可遏制的現象。

綜計上述國家改革幣值失敗的原因，不外(一)國家預算收支相差太鉅。(二)物資枯竭，生產力太弱。(三)政治不能安定戰亂破壞建設計劃，阻礙了復興之路。這皆為主要原因，貨幣膨脹乃是這些原因的表象。主因不去，貶幣表象，當然效力不能持久。

最使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史例，即為埃及幣制改革的失敗。埃及的通貨，在戰爭全期中，對比英鎊及美元均有其定價。而在戰爭期間，因為英美均以埃及為軍運站，以其物資及勞役之所獲，黃金及外幣的儲蓄量增加了六倍，銀行鈔票的流通量，不過增加四倍。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五年
100	100	100	100	100
(年)	(底)	(底)	(底)	(底)

(單位一百萬英鎊)

計其銀行鈔票的流通，向少於現有的黃金及外匯，但其一九四四年八月的物價，比一九三九年上半年的價格提高三百一十四倍。儘管黃金及外幣儲蓄的增加，國際收支的盈餘，以及對比美元定價的未變，仍不能使物價不漲。其原因即是埃及變為英鎊在非洲的軍事根據地，經常給養英美的軍隊，使埃及物資枯竭，物價不得不漲。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埃及政府以高出埃及及磅市價兩倍價格，把金塊換成銀行鈔票，企圖收縮流通中的貨幣，結果並不能平抑物價。

這個實例，很足說明黃金祇能在國際收支不足時，保證幣值不跌，倘若幣值跌落，起於內在經濟的原因，即是在物資極貧乏時，黃金也不能使物價不漲。所以我年餘來始終反對我國現在對外貿易政策，使自備外匯的商人及商賈不能很便捷的輸入外貨進口，實在是個錯誤。針對各國的失敗，我以為此次經濟改革應從全面着手，幣制改革不過為其中的一部而已。而這一份改革將來係成功抑如各國的失敗，也要看全般的改革如何而定，所以，我們不可祇集中注意於幣制改革一方面，此其一。目下經濟情況的惡劣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此種經濟情況之不能再任由它繼續下去也是大家所同意的，所以，今天在不能從經濟範圍以外去尋求辦法的條件下，以改革幣制這一方作法作改革的開端，是一件值得冒險的事，縱使改革方案本身有不盡善之處，也應該法求其盡善，以渡過此經濟難關，此其二。因此

我們不作吹毛求疵的指摘，也不作局部的枝節批評，祇願就整個改革方案提出幾點意見，就教於諸賢。

第一，此次改革方案，必須繼之以發展生產的計劃。不少人有一種誤解，以為今日中國的經濟問題在幣制，幣制一經改革則一切問題便可解決。我們認經濟改革方案之後，覺得政府似乎也有此種誤解。我們必須認清，我國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問題，所有財政物價貨幣各種問題皆由生產衰微而起。今天政府從混沌的經濟泥沼中舉出幣制改革的金鑰匙，企圖用來解決物價問題，這當然是個可喜的嘗試。然而物價問題不是根本的問題，根本問題是生產問題，物價問題不過是用以解決生產問題的手段之一而已，生產發達，才是我們的目的。所以在解決物價問題時不能忘却生產問題，尤其不能因物價問題的解決而妨礙了生產。但今天政府所作的，正犯了此病。試看在四項改革方案中，第一項是整理國庫收入，把稅率 and 國營事業收入恢復到戰前水準，這主要是以平衡財政收支為目的。第二項是獎勵輸出減少輸入，這是專從外匯方面着想。第三項是限定物價和勞務薪給和第四項的整理金融機關，主要以穩定物價為目標，抑且還有妨礙的鼓勵作用。四項方案不但沒有發展生產的積極意義，抑且還有妨礙的作用。根據國行總裁俞鴻鈞先生所說，今後生產貸款將全部停放（見八月二十一日大公報），這對民營工業是一個大打擊。雖說今後的利息禁止超過一角二分，但這和戰前的六厘相較，還是高了一倍，對於根基不同的廠商，仍是過重的負擔。所以我仍繼續我在行政院一年多的舊主張，對廠家實行嚴格定貨貸款辦法，以增強生產力。其次，此次幣制改革後，外匯從八百萬元驟升至一千二百萬元，原料的進口價格增加了三之一，亦即是說生產成本加增了三分之一。同時，進口的限額，經此次改革後，減少了四分之一。這一切不特減少了短期間的交易量；亦足以妨礙生產的發展。此外，對於在國外市場上競爭力薄弱或利潤較薄的工業，沒有規定扶助補償的辦法，至於如何發展國家資本，如何利用外資和外國的技術也沒有任何具體的計劃。改革方案中祇將注意力全部集中於幣制的改革上，忽略了生產的發展，這是一大漏洞，也是一大缺點。

第二，就改革方案而言，政府現在是撇開物價不談，而以全力穩定幣值，藉以穩定物價。我們以為此種方法是得不到理想的效果的。如所周知，物價的穩定，不但決定於通貨的數量和流通速度，同時也決定於物資的供應和需求。我國的物價固由於幣值的跌落而表現得高漲，同時也因物資的缺少才不斷上升的。假如承認這是事實，那麼，如撇開生產不談，祇從幣值的穩定上求物價的穩定，則縱使幣值能絕對穩定，也不能解決當前的物價問題，不特智者而後知。不錯，和幣制改革方案同時公佈的還有嚴格

的限價政策和其他經濟管理政策，但此種政策祇能有助於幣制改革的完成，不能作為解決物價問題的重要方案，其理也甚明顯。

第三，不從事生產的發展，不但無以解決物價問題，抑且幣制改革也不易成功。新幣制能否成功，須視財政和國際收支能否平衡或接近平衡為斷，這是經濟學的常識。但財政如何始能平衡？在量出為入的現代財政政策之下，必須以增加稅收為主要手段，增加稅收則必須生產發達然後目的可達。國際收支如何始能平衡？必須以發展對外貿易及求貿易出超為主手段，而貿易出超也必須以生產發達為前提。可知發展生產對新幣制的推行與成功，也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第四，施行貨幣改革之後，非法市場上的價格，仍有繼續增長之傳說。推究其基本原因，即是在流通中的銀行鈔票之總數雖減少，但沒有消除貨幣貶值的根本原因，即是說因十年來軍事行動所引起的枯竭與荒廢，依舊存在。換言之，即國家真正財富之貧乏，一日不消除，即物價一日不能平穩。如果說黃金美鈔有平抑物價之能，勿再說牠們有對外購進貨物之力，即是說牠們能立刻增進國家真正的財富，而增加市場的交易量。明悟及此，我們主張配合幣制改革，須要改變對外貿易政策，使華僑的節餘，不願以外幣的形式匯回祖國的，可以很方便的以祖國所必須的進口貨進來。這是借外資以補充我們的生產工具和充實我們的必需品之辦法。換言之，在我們市場極空乏的時候，在我們生產極微薄的季節，非有大量補劑的辦法，無法起死回生，如何談到康復呢？所以我始終不贊成限制華僑對內貿易的辦法。

基於上述的四項原因，所以我們固執的說，此次經濟的改革，最大的漏洞，也是最大的缺點，是忽略了配合發展生產的計劃。我們也知道發展生產不是唱嗷可憐之事，其收效不在目前而在將來，似不能濟眉之急，所以我們又主張配合以對外貿易政策。發展生產雖不能立即收效，但確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最重要的方案。現在幣制改革之初，政府正以全力求其穩定之時，加緊發展生產，導資於正軌，誘掖華僑進貨，增市場之交易，變管齊下，幣值或可稍定。幣值倘能稍定，更有利於促進生產。假如再聽此下去，甚至幣值又告不穩，經濟情況，愈加惡劣，工業愈受摧殘的時候，則更不堪設想了。說者以為促進生產與誘掖外資是衝突的，實則在填空的時候，不發生此病，好在我們有關稅自主權，亦不畏此病之發生。所以為今之計，政府應立即訂訂發展生產的全設計劃與改革幣制和管理經濟方案配合起來，全力推行。工作雖然艱鉅，却是挽救危亡的基本要道。徒假手於獎勵廣告，以平抑物價，不是永久有效的辦法。

我國對外貿易之重大使命與政府應有措施

(二)

·張會梅·
·楊博如·

且美國由於工業生產之激增，人民經濟充裕，生活程度逐步提高，工人報酬漸趨優厚，工資之高，超過歐洲各國。凡高工資國家之生產成本，自必較低工資國家為昂貴；因之美國工業產品，頗難與歐洲各國產品相競爭，設若聽任歐洲諸國商品自由輸入國境，則美國國內市場，必將形成「喧賓奪主」之勢，而迫使美國生產陷入崩潰之境，為平衡國內外商品之生產成本計，提高關稅稅率乃係最簡便而最有效之方法。故在工業化完成前後之兩階段，美國雖同樣實施保護貿易政策；但前一階段之目的，在乎保護幼稚工業之發展；而後一階段之目的，則在保護國內市場之安全，及勞工福利之增進，其意義固絕不相同也。

考美國工業化之起源，實肇端於拿破崙戰爭與英美戰爭，先後兩戰，予美國工業之刺激至大。在英美之戰後，美國之鐵工業、棉紡織工業、毛紡織工業以及玻璃、陶瓷等工業，均已相當發達，美國政府為防止英國產品之壓迫，特於一八一六年訂稅法，予各該項工業以關稅之保護，此為美國實施保護貿易政策之始。惟因所訂稅率不高，未獲顯著成效；爰復於一九二四年調整稅率，務期達到真正保護之目的。然以其時美國所有新工業之發展，多集中於北部，是以政府提高關稅之措施，北美各洲，固得保護工業之利益；而工業缺乏之南美各州，則反感生活用品價格高漲之痛苦。南北兩州，利害既各不同，意見遂趨紛歧，北美方面，對於政府保護貿易政策，極表擁護；而南美方面，則力向政府作改行自由貿易之要求，各據理由，互不相讓。且此種爭執，非特南北兩美不能調和，即中西兩部亦常不一致。美國政府為求適應全國經濟實際情形，藉資消弭國內爭端起見，乃於一八三三年將稅率酌予減低。自此以後，歷三十年之久，甚少改變。後於一八六一年，內戰爆發，聯邦政府乃大事增稅，先於是年八月及十二月連續提高關稅稅率，復於一八六二及六四兩年，先後調整國內各項稅收及關稅。計關稅平均稅率，在一八六二年約為百分之三十七，一八六四年則增至百分之四十七。自一八六五年內戰停止以後，直至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爆發，數十年來，除在一八九〇年頒行「關稅調劑」(Tariff Act of 1890)，更增高一般農產品進口稅，藉以阻止加拿大農產品之輸入外，關稅稅則，雖有部份修正，但終有增無減，蓋其保護貿易之政策，始終未見變更也。

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後，物價狂跌，工商金融各業，相繼倒閉，工人大批失業，整個經濟市場，既墜動搖，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美國政府希望運用關稅政策以阻止物價之狂流，乃於一九三一及三二兩年一再增加關稅稅率，開世界貿易壟壘之惡例。其稅率之高，幾使各國商品不復有輸入美國市場之可能。於是其他各國，羣起報復，美國商品，遂亦無法向海外輸出，整個國際貿易，由此乃形成窒息之狀態，據統計，一九三四年之世界貿易總值，僅及一九二九年三分之一，其衰落情形，可見一斑。一九三四年六月以後，美國目視危機之嚴重，乃授權總統與其他各國商訂互惠協定，以圖補救。然而此項互惠協定之作用，其活動範圍，僅限於互惠國雙方，實可稱為高度保護貿易政策下之「副產品」，對於整個國際貿易之繁榮，殊仍毫無裨益也。

第二次大戰既起，美國捲入戰爭漩渦，人民生命遭遇慘烈之犧牲，全國經濟蒙受重大之損失。朝野人士，目視國內妻離子散、折足斷手之慘狀，乃覺世界和平之可貴。同時激悟經濟恐慌為大戰之前奏，而「經濟國家主義」及「孤立自給政策」則又為恐慌之主因，今後必須有世界共同之繁榮，而後有一國之繁榮，亦即必須有世界全體之自給，而後有一國之自給。基於此種真理，深覺美國經濟必須與世界各國維持良好關係，方足以

達到安全繁榮之目的。且更以美國戰時工業之極度發達，本國國內市場，亦無以消化此項空前膨脹之生產力，使其對於國外之依存性，益形增高，「孤立」決不足以自存，「自給」決不足以自保。在此種認識之下，從而可知今後之國際問題，經濟與和平，美國與世界，乃屬一個問題之兩面；易言之：若無健全之經濟，即不能有鞏固之和平；若無安全之世界，即不能有安定之美國。而欲求國際經濟維持良好關係，則國際貿易不合理之制度，不健全之發展，非加以澈底之改革不可。由是在大戰期中，美國全國上下之經濟思想，頗發生基本之轉變，過去百數十年來一貫之保護貿易政策，乃為戰後自由貿易之一致主張所推翻。美國以至世界各國人士，咸希望透過自由貿易制度而使世界資源達到有效的利用，世界市場獲得公平合理之分配，藉以增進人類之經濟福利，保障各國之社會安全。是故「取消國際貿易歧視待遇」、「廢除國際貿易一切障礙」等口號，盛唱於美國，風行於世界。

自「大西洋憲章」公佈後，美國國務卿赫爾氏會根據該憲章所列舉之原則，擬訂「國際貿易互惠協定計劃」，頗為各方所重視。綜觀該項計劃內容，其最大優點，約有兩端：

(一)互惠貿易協定方法，係使用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條款，藉以保證差別歧視之不復存在，因之形式上雖仍有「雙邊的」意味，但實際上則有「多邊的」影響，與過去各國簽訂之個別互惠貿易協定，殊不可同日而語。各國如能對所讓步之項目，不作過於狹狹之解釋，以致喪失此項計劃之原意，則此項讓步，一經世界各國普遍採用，即可發揮擴展世界貿易之功能。

(二)互惠貿易協定方法，不受時期及範圍之限制，無論在任何時期，或任何區域，祇須善予利用，均可獲得累積之成果。且在引用之際，對於各種有關產業所能蒙受之「一時的」或「長期的」影響，在在均須鄭重顧及。此項方法，如能公正靈活運用，當為使可能永久利益及可能運繳成本於於公允平衡之一種捷徑，若與片面關稅相較，則此項方法之優點所在，厥為無論在縮減運繳成本至最小限度方面，或在若干實際可資接受之讓步方面，其進出口貿易之障礙，勢必互為策應而自動相隨減低。

據上述兩大優點以觀，赫爾國務卿之「互惠貿易協定計劃」，確具有掃除一切貿易障礙、消弭國際貿易各種歧視差別待遇之妙用，如能運用得法，頗足以發揮加強國際合作、增進人類幸福之效益。但能否獲得預期之成效，則須視國際間之願否精誠合作以爲斷，制度本身之臧否，雖關重要，惟若運用失當，執行變質，縱有良法美意，而結果亦終屬徒然也。

夫美國朝野人士由於最近兩次大戰慘酷之教訓，深悟未來世界之和平，胥有賴於世界經濟之合理改造；而世界經濟之改造，則又有賴於國際貿易之健全繁榮；為求避免經濟恐慌之危機，重演於美國，於是一般經濟思想，漸由「經濟國家主義」轉向於「國際社會主義」，實不能謂非一種良好現象。蓋經濟問題最為現實，而時代潮流無可違逆，誠如英國外交部出席國會次官勞氏 (Richard Law, Parliamentary Under-Secretary of Foreign Affairs) 所謂：「第二次工業革命之教訓，乃為技術方面之發展，已使人類社會結合至如此之程度，致使國家不復能成爲一經濟的或軍事或政治的單位」(一九四二年三月間勞氏發表之私人談話。此語之意義，並非謂國家將停止存在，或國家將不復能執行其有用之職務，乃謂在範圍甚廣之政治及經濟問題上，國家已不復能要求其權力——蓋因其已不復有運用其權力之地位也)；及英國在牛津大學納非爾德學院 (Nuffield College Oxford) 擔任半官方社會復興問題研究之柯爾氏 (G. D. H. Cole) 所謂：「僅國際的社會主義可使歐洲大陸有統一之望，歐洲統一之後，始可爲其一切人民計劃脫離貧乏之境，而登於自由之域。如回復至昔以至以資本主義爲基礎之國家制度，則歐洲問題之解決，殆爲不可能之事」也。

以「國際的社會主義」爲出發點之「自由貿易」，其主旨在使整個世界藉充分生產與平均分配之方法，俾得防止國與國間及人與人間經濟機會之失於均等，避免激起經濟的以至政治的鬥爭，從而消滅戰爭之危機，故其本質絕不能與過去「理想的干涉政策」或「十九世紀的個人自由競爭

制度」相提並論。過去「理想的不干涉政策」，在當前「現實的經濟世界」中，已不能發揮繁榮經濟之功能；而「十九世紀的個人自由競爭制度」，在「二十世紀的時代潮流」中，亦徒以造成社會鬥爭之惡果。斯則今後之所謂自由貿易者，決非「無政府狀態」之放任自由貿易，而為具有「高度計劃性」之公平自由貿易，絕無疑義。例如羅斯福總統在世界經濟會議中所稱「戰後之自由貿易，須力求價格公平」，既涉及價格公平問題，其非絕對自由也，顯然可知。是故美國舉德威爾氏 (Percy G. Reidwell) 曾設立「國際貿易處」(International Trade Authority) 之倡議，英國自由黨亦有建立「國際經濟組織」之主張，以及英國國際友誼及社會責任教會委員會「國際貿易與財政」，在必要時應由具有權力之國際機關統制之，英國勞工大臣貝文「世界原料及主要食糧均須由國際統制」等意見，決非反對自由貿易之原則，蓋均認定自由貿易必須在國際統制或管理之範圍內進行也。

國際統制或管理之意義，在乎防止世界資源、市場僅為少數集團或少數國家所操縱；申言之：即各類主要民生所必需之普通商品，務應絕對避免被有關之生產者所壟斷；各類具有國際重要性之特種商品，亦應絕對避免被有關國家之代表人所控制。然而過去以至現在之國際貿易中，資本主義國家獨佔組織勢力之龐大，殊屬不可忽視。美國國家臨時經濟委員會報告中，曾指稱：「和平時代之經濟統制，自生產、價格、分配以及其他經濟過程觀之，乃係集中於極有限之大企業家之手」。此類「大企業家」，純以私人牟利為目的，其能顯及社會大多數利益者，殊屬鮮見。會有人謂：「卡特爾實在就是一種獨佔世界市場和原料供給的資本組織，它之違反世界經濟合作，阻止進步發展，是昭然若揭的。同時，獨佔資本的高度發展，不但將使列強各國的階級矛盾日趨尖銳，而且也是促成國際間武力衝突的基礎。所以，戰後人們要維護世界的永久安全，對於這一制度，勢非予以剷除不可；而克里米亞會議所揭示的經濟民主，其實也就是對這種獨佔壟斷的組織的否定」(見二卷三期四川經濟季刊姜慶湘「世界經濟前途的展望」一文)。據美國人士之見解，亦會有人謂「……一般原料，需要缺乏彈性，而同時收穫豐富穩定，或生產因素之移動，異常困難，或勢必傾向於過度之補償，以響應價格變動之工業，較諸他種在價格機械作用下獲得合理調整之工業，困難特多，故亦比較適宜於統制之措施。因之此類工業，亦最易演為生產者所操縱把持之統制，而使消費者在受其剝削與榨取。……計劃並實施統制政策之公家理想，不僅希望獲得自由競爭價格制度所能獲得之同樣效果，抑且希望減除自由競爭價格制度的浪費，尤注視其與金銀估算無涉之種種人為的因素。至從事於操縱或一般牟利生產者之私人理想，則務求運用獨佔權力至最高限度，以便保持此項權力於永久。此兩種理想，互相衝突，殊難並存。然在今日習見之被生產者所操縱之統制形態下，前一種理想，未必能發生決定性之影響」(見 *Economic Study* 所著 *Raw materials In Peace and War* 一書)。由此可知在自由貿易制度之下，私人獨佔組織若不能設法剷除，則操縱資源、壟斷市場之風，實屬無法防止；而「國家主義化」之一切貿易障礙，非特難望澈底消除，且必隨生產之無限擴張而更變本加厲。據過去之經驗：瑞典在一九三〇年以前，原設有油廠兩所；但因受國際卡特爾之壓迫，不得不相率停工；此項獨佔組織，並特別聲明：除非瑞典國會對植物油實施保護關稅，必不使其有開廠復工機會。設若私人獨佔企業仍任其繼續高度發展，則此類事實，既能發生於過去，又奚能保證其不發生於今後？於是所謂「自由貿易」者，變為獨佔資本主義者經濟侵略之利器，國際經濟局面，益形複雜而混亂；而世界人類「不虞匱乏之自由」，乃又須俟另一次大戰後再論矣！

夫私人自由企業制度，乃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最大特徵。此種制度對於世界文明之進化，確有不可磨滅之功績。蓋當世界產業革命發軔之初，社會上祇感物質生產之缺乏，非求生產力之擴張，無以拯救人類普遍之貧窮；於是在「生產第一」之目標下，一方保障生產利潤以誘導私人之投資，一方利用自由競爭以刺激生產技術之改進；前一方法，足以集中民間所有之財力；後一方法，足以發揮各人所有之才能；因此先進諸國之工業生產，即循「私營」之途徑而飛躍發展。據估計：在第一次大戰以前，世界貿易額約每十年增加一倍，人類生活之需要，得以低廉之供應，代替昂貴之來源；一般工業國家之人民生活，賴此日見改善；同時工作負擔亦賴此而逐步減輕。是以私人自由企業制度之造福於人類者，其功固不可沒也。

洩幣獄與王雲五徐百齊之官運

· 黃 河 清 ·

爲三十七年「八一九」改革幣制洩露政府機密，引起軒然大波之財政部主任秘書徐百齊氏，一時名噪四表，成爲時髦人物。而徐一向側身王雲五座右，累二十年深交，居然以故交損及新貴，使社會賢達，反至遠而不賢，毀謗紛然。王雲五素常治事之失檢蓋可想見。

猶憶此「智多星」王部長於行憲政府初組閣時，以原張任副閣揆落選，竟無所歸。翁相國虛意徵賢，乃「不辭大馬」，實屬大勇。殊不自量其「四角號碼」，對「金鈔股票」將作何運用焉？果然，王氏接篆之初，召集同仁訓話時，即侃侃自曰：「予雖非財政專家，但對工商尙自問有心得。」拿出主政經濟部時代之經驗，益以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之閱歷。王氏於是頗有把握。然蒞任移時，全國市場空前騷動，游資洶湧，物價浪濤奇變。王氏之自信爲之驟斂。而「百搭」之雅號亦變爲「百搭」之諷刺流行語。

政府決心以閃電戰術改革幣制，實行有計劃全面經濟管制，實使王怒一口氣，而替賢達撫了許多醜。不期這一巨變，竟是「譽從天外來，醜由座邊生」，王部長竟樂極悲來。相隨二十載之幕僚，徐主任詬害百齊，不衡輕重，敢於事前將改幣日期透露於內幕中人陶啓明秘書，乘機牟利。輿論大嘩，偵網四佈。徐之「金蟬脫殼」計未授，自請看管，表明心跡，乃使羅者省却許多追奔搜捕麻煩。陶某供出機密來源時，王部長於惶恐失措之餘，亦不得不忍痛批准撤職逮捕徐氏以自脫干係。王氏之管理經驗，「百搭」本領，於此畢露。

當兩年前，王主政經濟部時代，王雲五一身賢達味，公家場合，總不脫「參政員」爲民衆謀福利之口吻。克保「達」之令名，雖少建樹，究無失其一賢」譽。某次，筆者以某報記者身份，爲專訪王氏於官邸。徐百齊

於辦公室。告以約晤而來。徐不爲理，乃轉晤次長蕭鈺，談良久而出。殆歸報社，即接吳培均司長電話，知王部長踐約相候，乃重造部長室完成「訪問記」(該文刊於三五年九月上海某報)。由是，徐氏予筆者一深刻印像；即「少年得志，官氣十足」是也。

徐百齊本名均，江蘇吳縣人，年尙未惑。與陶啓明同屬東吳大學畢業生，攻法律。從王部長於商務任人事副課長。知法而有經驗，辦人事，更有「知人」之明。詎料其竟惑於祿位，而輕擲法紀，失却知人用人之故智。自身之愚累及達者之賢。亦可慨已。徐爲人短小精幹，風度翩翩，自外觀之，固一斯文之少年書生。不出事於經濟部，而生非於財政部，殆亦願步「高乘坊」之後塵歟？高某終身有託，恐徐某有此重大案情，均堪作國民政府貪污吏列傳人物，孔老板拉高弗克掩護，而終受其累，王部長之前程殆將誤於徐而從此「跌價」乎？

本刊廣告價目表

地 位	全 每	半 每	1 每	4 每
封 面	版 期	版 期	版 期	版 期
內 封 底	二十元	十元	七元	四元
內 封 面	十七元	八元	五元	三元
內 頁	十三元	七元	四元	二元

鄉建重點與鄉建難關

· 申銘 ·

(一) 前言

今日舉世滔滔，凡辦一事，無不困難，知其難而不為，是為懦，夫救死不暇，何堪再待？非仁者所宜；然輕其事功，貿然為之，或執一家之言，議論多於實行，非狂即妄，即自欺欺人。農村疲敝極矣，百姓困苦極矣，吾人知之敢言，臨難不縮，庶乎近焉。

(二) 鄉建問題之論觀

(1) 政治問題說

鄉建問題，即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民之問題也。是農民之困苦，即鄉村之不安，鄉有擾，而城亦動矣。政治既是「管理衆人之事」，鄉村之破產，即政治之失敗，至少縣政應負其責。試看重租苛賦，政治法令也；貪污橫行，政治人事也；他如土豪劣紳，高利商貸，游兵散勇，烟賭猖獗；察其事狀，考其背景，無一非政治之腐敗，有所縱容，以致如此。故論者如欲建設鄉村，須從政治革新起，至少縣政要澈底改造，始能開始工作，否則任何鄉建方案均將束之高閣，任何農村投資，均將化為烏有。試觀中央年來之推廣合作，成為土劣合作矣，中農之貸款，變為放青苗矣。他若農場示範，非為一區之點綴，僅供裝飾，更與農民，決不相干。此無他，政治之不良，鄉建無由推動，況值內戰，烽火連天，

前方老弱轉於溝壑，救死不遑，後方征兵征糧，雞犬不寧，尤有甚焉，何以語鄉村建設！

(2) 經濟問題說

今日鄉村之大病，在於重租與苛賦，每畝租率，地主榨取生產量百分之五十以上，至於田賦，照今年征率，每畝銀元一元，應征賦谷三斗，借征三斗，自治公糧五成，此外附加自衛捐五斗，自治捐二斗五升，出征軍人一斗，積穀一斗，教育一斗，每畝共計賦谷一石一斗以上，合白米五斗半（本月十四日大公報載江西省呼籲），至少佔去生產量四分之一，其他之額外需索，尚不計焉。查農民生產成本，常在收穫量之半數以上，如每畝產白米二石，除成本一石，賦谷五斗半，此四斗半米，如何過活。江南田地，大半租業，成本一石，交租一石，是則佃農只有被迫走死而已。

農村經濟之害，不特此也，他若商業資本之高利剝削，烟賭廟祀神婚喪節俗之浪費，勤勞良民，將何以堪。鄉村建設，不從改善農村經濟着手，侈談教養、衛生、南轅北轍，不為天下所笑乎？

(3) 土地問題說

鄉村農民之困，在於重租苛賦，高利剝削，貪污土劣，游兵散勇之壓榨，前已言之。其根本極救之方，應從土地改革手中解放出來，一針見血，抓到癢處。中國之土地，大部在地主管下，

江南半產之耕田，當有一半以上，由地主吃租。中國之地主。不勞而食，非若外國之地主，視作生產條件，尚有科學經營管理之功。改良土地，地主不問也；增加勞力，地主不與也；施肥除虫，地主不管也，如有增產，地主則挺身而出，伸手要收租糧，一半以上，依其增產額量，此率加收，天災荒蕪，則不負責，更不問訊。此等地主制度。不啻虎狼所為，中國農村，因此千百年來的土地制度，又形成一種半封建的社會勢力，為一般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所盤據，依勢凌人，民怨無伸。試觀抗租抗糧，每起風波，總衙押佃，囚犯疊疊，故欲求鄉建，應自土地改革始。改革土地，不外廢租，減賦，將一切耕地，公諸耕者農民所有，以提高其生產興趣，否則一切改良農耕，施肥除虫，技術雖善，與民何干？縱能辦幾處示範農場，也不過是一方的花瓶盆景而已，要救農村，就該改革，否則繞道而行，不着頭，此非緣木以求魚乎？

(4) 教育問題說

吾人習聞教育救國之說久矣，自戊戌維新至五四運動，前者有張之洞、李鴻章之請廢科舉，興辦學堂，綜之民國以來之平民教育，職業教育，社會教育，農村教育。時賢輩出，用心非不善矣，試問與救國拯民，尤其對於三億二千萬美之農民生活，發生若干效果。大學教育，畢業即失業，學校育失敗矣；平民教育，以推廣識字為要務，中國之文盲若干，減少若干，無以聞焉。且農民識字，亦非朝夕，生活不安，垂死有待，救之識字，即能活命乎。晏陽初先生，近於大公報（八月十四日）發表一文，以建設農村，要發揚民

力，即發揚其知識力、生產力、健康力、組織力。以愚度之，即教育、生產、衛生、組織四大工作，為鄉建之四大支柱，旨哉其言。晏先生以平教首功，擴大其工作範圍，可知其業已認識鄉建工作之複雜性，須多方為之，如仍以教民識字，提高其文化水準，就能發動農民起來，熱心生產，恐其未必如此簡易。管子曰：「倉廩實而後知禮義」，語云：「民以食為天」，農民最為現實，一飽之不暇，立錐之不安，何以奮然承教。吾人以為不做鄉建則已，若然，必以改善民生，使之苟安勉活，「養」之為首，「教」之為次，至於「衛」字「衛生」，尚不如「自衛」要緊。梁漱溟先生之在山東，係以自衛平訟，爭取民信，展開其鄉建實驗工作，未知教育學家，以為然乎。

(三) 鄉建重點之把握

以上四大鄉建論點，各有其特點，要皆不可偏廢，亦可名之曰四大鄉建重點。茲再試論其工作途徑，就正於世人。

(1) 刷新縣政以平民怨

中國之老百姓，尤其農民，若有怨抑，則訟諸縣大老爺，聽之真命天子，雖說民主，此念未變。故縣政得失，對於農村建設，關係甚大。然今日之農村關係，建築於封建組織之上，鄉紳縣吏，互相勾結，無事不與農民之利益，背道而馳。例如民嫌苛雜，而胥吏豪紳則滋為需索也；民要減租，而官衙倉棧，則利為併征也；民願息訟，官則提起公訴，民若自衛，官則派隊彈壓。今日之地方政權既操諸於封建勢力貪污剝削集團之手，以榨取農民血汗為能事，則一切政令，無不

與農民立場相矛盾。縱有二正紳好官，無能為力，反被排斥。現在之縣參會區鄉保甲長附屬於封建集團之下，其有為民打算仗義執筆者，不被綁架失蹤遭人暗算者幾希矣。是縣政不改革，無以語鄉建。況今又在「戡亂」時期，法令如毛起朝夕更改，民無以安，何由復興？今後鄉建，果真劃區，至少要一縣為單位。這一縣區，在不違背憲法原則之下，必有制作法律，行使政令獨立之權，而教養人民，也應自教養縣級自治人員，而幹部人員，更要訓練。先做到平訟訟爭，裁制豪霸，廓清封建，始克有為。

(2) 廢租減賦以輕民負

二五減租，既有名無實，世界大勢，經濟變革，為今之計，不如廢除租佃舊制，解放農民之束縛。廢除租佃之法，莫如耕者有其田，實行土地改革，後而論之。今先言減賦。夫租者，個人之所為，私經濟也；賦者，公家之地稅，公經濟也。故租可廢而賦應減。今日之賦，征糧以來，已逾古制，重於明清。考田賦古制什一之稅，依租十分，官取其一。例如每畝租米一石，賦取一斗。明清重賦，以租為賦，每畝重達三斗。滿清入關，甚不滿明宋元璋所為，會李鞏於同治議減，每畝不過一斗。今之田賦征糧，征一借一，再加附加（見江西報告），每畝每元合稻谷一石一斗，白米當在五斗半以上，曠古未見，乃苛政也。况減租未行，地主又要收租產額之半，農民在租賦重壓之下，無以為活矣。時人日為呼號

，減租減賦，而地方官紳，我行我素，充耳不聞，政府日唱高調「耕者有其田」，而豪強兼併，更甚於昔。近者又有土地改革之論，與縣參議會，竟有以七年地租，以米作價，責令佃農於二三年內贖地之法。湖南之農會理事鄧魁梅，未見減租之行，早以身殉於地主豪霸血刃之下矣。鄉建首要之圖，端在廢租，實行耕者有田，讓賦減糧，每畝不過白米一斗之限。否則，無以對今日之辛苦農民，且無以對會李同治時代歷史上之貢獻也。鄉建云乎哉？興農云乎哉？

(3) 土地改革以振民力

學陽初先生，主張發揚民力，以為鄉建之要，誠然然民力之發揚，必先解除農民之束縛，否則四肢被縛，動作不得，何由以發展其力？土地制度，重租苛困，民之如被縛也；地方勢力，維護地主，武力催征，與獄設牢，驅民入淵也；故土地改革，為當今要圖。論者廢除租田，在於取消不勞而食之地主。和平方式，有「稅去地主」「買去地主」之法；激烈方式，則有「賜去地主」即劃分田之法。前者自為人之所樂聞，鄉村建設，自亦不願流血辦法。然稅去地主，莫善於地價增值稅，此項方法，適於都市，而不合於今日中國之農村。蓋農地無從增值也，於是於今日大小果進增稅之法，然地稅愈重，而地主則加之於佃農之負擔愈苛，租賦困擾，政府更感無力執行。於是多人主張，由政府貸款人民，買去地主，此法雖妙，要視政府有無此項大量資金。同時以政府估評地價愈低，農民償還期間愈長，即刻能使農民耕用，始為此項土地改革成功之要訣。東歐諸國，土地改革，以地價百分之十，分十年廿

年價還，更限自耕面積，不得過五公頃，以防自由合併新地主之再生。可作為榜樣，然未悉國人以為如何也。

(4) 普及教育以增民智

以上三端，能見諸實行，則民可活，而力可揚，從而教之以知識，助之以技術，推廣農業，增加生產，自助自衛，百廢俱興，如此農村是復興矣。鄉村教育，既不偏重於學校，造就「官才」，更不偏注重書本，擴大教學，凡足以啓發智識，改良風氣之教育方法，若游藝，電影，戲劇，群眾運動，皆可為之。又平民識字，其推廣之方法甚多，壁報刊物，時事漫畫，皆可利用。陶行知之小先生制度，普及成人，至堪採取，此次美貸農款，用之全國，則嫌其渺，施之幾縣，則綽有裕，如是鄉邦，都鄙乎文哉！豈不樂歟？

(四) 鄉建難關之打破

要以言之，齊之以政，資之以生，是為首要；教養術等，從而導之，立可待矣。雖然，知之匪艱，行之為艱乎，行之匪艱，知之為艱乎，此種雞生蛋，蛋生雞之辯證，不必詞費矣。今日而語鄉建，難關重重，確乎存在，要看執行者，是亦有此決心，剷除障礙，吾人得拭目以待之也！

(1) 兵匪遍野肆虐間里將如何

內戰方酣，兵匪遍野，游勇棍徒，出沒無常，試辦一縣，治安即是問題。盜賊之迫於生活，挺而走險，尙可治也。今日鄉間，風氣敗壞，市井無賴，奸滑統袴、勾結軍人，借假背景，侵佔民房，包庇烟賭、偷稅走私、強買巧賣、無奇不

有。「戡亂」以來，軍系又多，稍加制止，動輒得咎。愚料鄉建人員，必多士者，秀才遇兵，有理難說，此種黨惡勢力，如何剷除，此其難關之一也。

(2) 豪紳橫行武斷鄉曲如何

今日之鄉政，在豪紳把持之下，地主土劣，位列鄉官，參議員也，保甲長也，大部由此等人物充任。地方官吏，又喜相接近，與之勾結，酒肉徵逐，毫無吝色，所費一切，則藉詞科款。正人君子，側目而視，既不敢怒，又不敢言，廉恥喪盡，道德淪亡。鄉政之要項，首推征糧，既由此輩操縱，而國家行局，藉購統銷，亦常授權彼輩辦理，其剝削生產小民，驅長莫及，無以監督，尙有可說，而國家貸款，亦由彼等居間承辦，低利收進，高貸放出，何處非然。他若架詞挑訟，愚弄鄉曲，不勝枚述。此種可惡封建勢力，又直接間接，均有其軍政背景。在鄉建縣政之下，容認此輩，與之同流而合污乎？抑大刀闊斧，儘行掃掃，以實行縣政革命乎？此其難關之二也。

(3) 自治自衛地方經費如何

鄉村建設，劃區示範，即將辦矣，自治自衛，是為首要，推動費用，動輒需資。當此農村凋敝，民無以負，派捐豪富，人無以應。鄉建目的，非僅安民，且要福民，今福民之未及，安民之未過，何忍以鄉建費用，驟加於普通百姓身上？其由政府撥款乎？美貸項下動用乎？美貸借款，或已內定，用之事業，而不投諸政費，然政之不舉，農無由興，未知高明，何以處之，此難關之三也。

(4) 行政系統選賢任能如何

「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此中國之諺也，「幹部決定一切」，此西人之語也。歷觀古今中外，時代之治亂，人事咸否，常在事功成否一半因素以上。吾國行考試制度矣，未見官吏之盡皆考試也。多年提倡文官制度矣，事務官之保障仍無也。且實驗縣政，建設鄉村一切辦法，自當與舊有別。今日之上述法令，多如牛毛，下行之後，未見實效，反多牽制。地方既無自治可言，凡事皆假名中央集權，俾特權份子，上下其手，居間把持，以遂私慾。今後如欲推行新政，自當超然獨特作風，自制法律，自訓幹部，始能有所作為。如以鄉建興農大業，敷衍門閥，割裂分贓，則為不旋踵而覆敗矣。當其事者，是自有此決心，不畏豪強，秉公辦理，與特權份子奮鬥到底乎？此其難關之四也。

(五) 結語

余為此文畢，人或起而責曰：「興農乃吾人之目的，鄉建乃興農之手段，至於革新庶政，乃手段之手段，似屬不太重要，以今日之興農，如古之勸農，獎民善耕足矣。」此見山不見林之談也。夫農非不耕，擾之不耕；民非無力，縛之無力。是縣政與興農，息息相關，不可分離也。抑又有感焉，外國做事重制度，而中國做事在人事，即如復興農村，工作難關雖多，人事配備最要。若以此事用為盆景花瓶之點綴，則辦幾處農園新邨即可，無煩世人之慮矣！然乎否耶？

滄桑明眼錄

秦越

最後之督撫

接全是湘軍的人物任督撫，只偶然以少數的旗人作點綴而已。

清代治要明中葉以後之地方政制，將最高之地方行政區寄於督撫，雖然設督撫之用意，本為軍事上之指揮便利，所以體制非常尊崇，而所轄之區域也不固定，但久而久之，每省都或有督，或有撫，或有督而兼有撫，或有撫而仍稟命於督，遂成清代一種奇異的政制，督撫本是統帥，到清代叫做封疆，藩臬兩司本來是方面官，到清代叫做監司。咸同以後，有鑑於胡林翼駱秉章以一省巡撫而能統籌全局，又鑑於曾國藩沒有督撫的地位以致成事艱難，知道督撫的人選，必須在新興的人物中求之，於是統兵將領之從文員出身者，往往昇以督撫之任，而有名的督撫，所保薦的特別人才，也就預備以為他日繼任地步。比如胡林翼之於嚴樹森，曾國藩之於沈葆楨就是。他們確是公忠體國，並不專從自己嫡系中舉人，而所舉的也確是足以勝任的人物。曾氏本來非常小心謹慎，不肯擅自保舉封疆人選，但是一時的風氣已經如此，同治年間，重要省分，已差不多直接間

傅曾氏之衣鉢而又能開門徑，成名最早，受任最專，而享年最久者，是李鴻章。李氏自同治初年以至光緒末年，身任督撫，幾四十年，當然能造成領袖的地位，他的一舉一動，不但能影響當時，而且為他的後輩所師法。清末督撫之局面，可算是以他的力量造成者為多。

清末督撫之局，有非前代藩臬所可比擬的，前代的藩臬，勢力膨脹到相當程度，便有私其土子其人之意，所以不是強藩問題，就是王室削藩。前者成外重內輕之局，後者成內重外輕之局，在宋以前，這個難題始終不能圓滿解決。督撫則不然，其權雖重，而仍須受命於朝，一紙詔書，便可放歸田里，不過同光間的督撫，已經成了一種開關，他們的作風是一貫的，他們的黨援是互相牽引的，他們的勢力是彌漫於官吏軍隊之間的，就是罷黜一兩個人，並不能改革一時的風氣，也不能肅清其勢力，所以個人之進退，不甚足為

影響，要其已成之局，已經打破了中央集權之形勢，而地方勢力遂不容否認。

督撫權重，由於軍事時期不能不假以理財用人之自由，及至軍事暫告終了，而外患始終未息，有許多事不能不倚任他們去籌劃辦理。新的要求越來越多，斷不是承平制度所能應付。即以財政一項而論，當用兵的時候，平常的各省經制兵，即所謂綠營，費很大的一筆款項，並不能得力，却是又不能毅然廢去，而真正出力打仗的，一定要靠募勇。募勇是沒有限制的，在最緊張的時候，湘軍的勇營幾乎有一百萬人之多，政府除了經常費一點不能減少還要照付之外，拿什麼錢來維持這樣龐大而又無定的武力呢？在田賦上增收，是煌煌祖制所不許的，別的也沒有開源節流通盤籌畫的辦法。所以不得已只好聽這督撫自己設法，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抽收商貨通行稅，名為釐金。商人仰仗地方官兵的保護，能以運貨牟利，是很欣然樂從的，而地方官兵在自己經營監督之下，取得這種固定的財源，不致受一切文法之拘束，餉源既可靠，軍心自然安定，湘軍之所以能奏效，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釐金本是一種臨時濟急的辦法，無成例可循，其經收支撥方法，及用人章程，都是據有軍事實權的督撫自己訂定，不但非中央所能拘束，甚至完全以主辦的人為中心，別人也不能過問，比如胡林翼之在湖北，駱秉章之在湖南，就是這樣。及至軍事結束，地

方還有許多善後的事，也要靠撥金，於是竟成經常的地方收入而不能裁廢了。督撫既有了自由課稅自由支配財政的先例，便可以辦許多事，政府明知事是要辦的，而錢是拿不出的，當然也不肯割奪他們這個權柄了。清代中央收入，幾乎完全靠各省報解，因為大宗是田賦，當然完全是各省所經收，後來鹽政也歸總督兼管，關稅由海關道經管，也受督撫節制，如果他們不聽命令，紛紛截留，則中央簡直無法維持——幸虧那時中央所需的政費還不多，所以理財之權，不能不很寬大的交與督撫，養成他們的責任心，對於中央方才肯履行解款的義務。在承平的時代，並沒有什麼新興的事業，光緒年間，因為要仿造西洋的機器製造，又要舉行許多的新政，如學校警察之類，費用都是非常龐大，都不是中央所能負擔的，於是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叫各省自己去設法籌款。這種款項，有的正式報部有案，還可以作為監督，有的就在不報部的款項內自收自支，而收支的的手續又僅憑督撫個人的意旨，其間出入就非常之大，這種款項謂之外銷款項。外銷款項乃是做督撫的養命之源，現在的話所謂生命線。他們沒有這種錢在手，是沒有法子做官的，當日所謂養廉銀兩，在清末是斷不夠揮霍的。

清代外官與明代不同，明代京官人少而權重，大家羨慕京官。清初還是沿襲着明代風氣，加

上滿人初入關時的氣餒，京官很能發財。大約後來弄錢的法子精了，才又以京官為不足副其奢望。王開運在他的圓明園詞自注裡面說：「本朝吏事蓋凡四變，當順康時，州縣多不足衣食，外吏亦未有脂膏，然京輩貴家富厚充斥，及於雍乾間州縣大富，嘉慶二十載，府道高賈，道光之時，督撫擁財，則上下俱困，盜賊起矣。」這是博通治理洞見癥結而又嫻習掌故的話。道光以後，州縣官剝削小民，變本加厲，其中一部分是要歸到上司荷包中的，而督撫入親的花銷，部費的點綴，以及歲時對京朝貴官士大夫的餽贈，又是一筆極可觀的數目，若不自已多設方法，巧立名目，移樞換柱，東挪西補，公家又何嘗替他預備這些公費呢？（據張集馨年譜，他在道光末年放一個道員，出京時要用去別敬幾至二萬兩。）京城裡的王公卿相，曹司百官，下至胥吏役，僕御輿臺，那一個不指望外官的廩餉，才能有所生發。督撫是外官的總代表，尤其是不能岸然道貌的，那不獨為小人所不容，君子也不能相諒。及至光宣之交，政府賄賂公行，疆吏進退，繫於苞苴之多寡，簡直有釐巨金於樞門以博伊涼的。到這個地步，就光是收點小苞苴，也無濟於事，竟必須在公款中隨意動用了。光宣之交的政界風氣，是

古今一個大變局，督撫的用錢如泥沙，連光緒初年的李鴻章也有所不及，其中有一兩個著名喜歡做事的，簡直拿公款用起來，比自己的私囊還要

沒有限制，私囊還有妻妾子女的干涉，還要為子孫留地步，他們對於公款，既不怕部駁，又知道京官抓不住把柄，地方紳士只要籠絡好幾個，也就沒有人出頭說話，可以說不對任何人負責，將來一篇爛帳，誰又能奈我何？就這一點而論，簡直是古來帝王所未必能辦到的。後來他們離了任，或改了京官，錢沒得這樣容易了，可是手鬆慣了，便不得了起來，於是他們的親信部屬，以及有關係的僚友，依舊在地方公款中，設法調劑，以供其私用，因此外官的風氣也傳染到中央來了。民國初年的人，看慣了這個榜樣，所以內而總長，外而督軍，無不化公為私，予取予携，馴致巨富有大有人在，確是往時的人想像不到的。

（未完）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論幣制改革

本座談會所發表各人之意見，純係研究性質，特此誌明。

社會問題座談會編輯處

(以文到先後爲序)

* * * * *

喻金耶：近來談幣制改革的人太多了，我沒有什麼新的意見，因爲不善隔靴抓癢，不得不說得放肆一些。

第一，這次改革是在經過十一年戰爭，法幣已喪失了貨幣功能，國內經濟情勢實在無法支持的局面下，不得已而出此的，所以根本的動機是加緊「救亂」！是挽救戰爭危機！

第二，新幣名爲「金元券」，正因爲是「券」，它只是不兌換紙幣！當然只允進金銀外幣而不允出，如果一定要說這是有準備的，所以是「管理金本位」，那麼我也不必強辯，請回想十三年前推行法幣政策之初，不也揚言有準備嗎？

第三，國內人民黃金只能有飾金二兩，但存放國外資金在美金三千元以下者可以免於登記，登記這辦法真好，在五個月限期內當然可以從容提走，便不登記又奈我何？與邦友政府交涉嗎？在「當地政府不予協助」的口實下，可以一筆勾消。

第四，兌換率並沒有仿效蘇聯差前兌換辦法，即政府無意借此大好良機調整社會財富不平之現狀；但又口聲聲說實行民生主義，我們仿效蘇聯。

第五，發行額的限度超過收回舊幣必要量十倍，更因爲「內亂」的關

係，貨幣流通區日益狹小，相對的通貨數量愈形增多，而兌進金銀外匯所發的數額尚未計入，銀行信用亦未估計。

第六，物價硬性規定不得超過八月十九日市價，但原料照新的外匯率折合，成本要增高百分之五十。

第七，各項捐稅將照戰前幣值計算，包括唯有固定收入「獨享」的所得稅在內。

第八，工人工資按新幣計算，還不如打了對折的生活指數計算爲多，公教人員薪津與戰前比，等於打二折乃至一折。

第九，金融機關在兩個月內要增資三萬倍以上。（按法幣一億資本額計算，如爲一千萬則再加十倍，中央銀行資本便只一億）。

第十，幣制改革未十日，政府已將發行公債，依法，公債可以充作發行準備，發行準備，準備發行，這一套，那一套，還是老套。

以上是改革幣制的十大「功德」，諒非憑空構想，這不是變相的膨脹政策嗎？不是搜括民間財力嗎？不是迫民族工業垮台嗎？不是剝削勞動者（包括腦力勞動者）嗎？不是放鬆豪門嗎？不是替金融寡製造吞併弱小行莊的機會嗎？……政府以人民爲芻狗，我是平民，所以即是狗，「狗嘴裡吐不出象牙」，因此我說：「這改革是混身上下滿布最嚴重遺毒的初生嬰兒，一定是夭折。算命先生說拜馬、Katherine、Goffe的做乾爹可以長壽，我看拜乾也沒用。什麼國家受得了不停的戰爭破壞與消耗，不要說美援！

整個美國變來也是狂然，這是一個以奴役、榨取全民而維持「家天下」命的絕法，它的特性是：剝削又剝削，掠奪又掠奪，破壞再破壞，附庸再附庸，故結果一定完蛋更完蛋。漢武帝聚斂大臣桑弘羊以白鹿皮作制錢，還只是刮王公大臣的皮，這辦法，嗚！無可比擬。只是秦理救命的「撒手鐮」，我願這撒手而去的武器可以致敵死命，萬不能對手未死却落了「回馬槍」。「好人長壽，禍害活千年」，菩薩會保佑他的，阿彌陀佛！

★ 孟憲章：此次金圓券發行，政府爲鞏固幣信起見，特充實發行準備，用意至善。茲貢獻可充發行準備之兩筆財源，希望政府爭取。

★ (一) 日本賠償 我曾在工商天地三卷五期，發表過「日本賠償的幾種估價」一文，認爲根據損害賠償原則，日本應賠償我六百五十億美金。根據德國賠償先例，日本應賠償我一百至一百六十億美金。根據能力賠償原則，日本至少應賠償我五十三億美金。但即根據遠東委員會所通過之臨時賠償品折遷方案應折遷之一〇九〇所工廠言，現在主要的只折了十七所海軍工廠。從這個方案提出的百分之三十先期折遷物資，也不過折了十分之一。根據最近辭職之我國駐日歸還及賠償委員周茂柏氏報告，價值美金六千萬美元，根據中央社估計，才值一千七百萬美元。

★ (二) 日本歸還物資 日本在抗戰期間，掠奪我國物資，何可勝計。根據盟國對日基本政策，是應無條件歸還的。此種被掠物資，如就金銀言，約值一〇〇六〇美金，銅錢幣約一萬噸，約值五百萬美金，機器及廣州造紙廠機器，約值四百萬美金，船一百二十艘。但現在歸還我國者，僅值一千三百餘萬美金，運回國者只值三百餘萬美金。

★ 倘能對這兩種財源，努力爭取，對政府財政，民間建設，均將有大幫助，豈只能充實發行準備而已。

★ 方建民：政府這次下了最大決心，竟然把一榻榻的舊法幣改革了。

★ 恭喜今後大家有了安定生活的日子過，但是這僅是一個美麗的夢，往後苦的日子多着啦！我們是不會相信幣制能改革成功，除非個個像饑饉無私的蔣經國，拿着槍桿對着這喪心病狂的好商，不管大老虎或小老虎一網打盡，這樣新幣制的生命或許會延長一些時日。可是飯面無私祇有蔣經國一個，北平就鬧着「要向上海看」齊的事，其他各地更不必談起了，說不定爲了幣制改革一般政府人員反發了一筆大財。

★ 這在內戰劇烈的時候，怎樣可以改革幣制？改革幣制最重要條件就是和平，和平時候可以大量生產，政府亦免發出一筆戰爭費用，財政才有辦法收支平衡。現在內戰期中，前方五百萬戰士，單提一桿手機關槍言，每一分鐘要發幾百粒子彈消耗，從去年打到現在，又要從現在準備打到以後久遠，此外還有飛機、大砲、軍衣、糧食等都要用錢去買來的。再說生產，華北是戰區不能生產，華西是一個貧窮地區，又常鬧着邊疆民族政變問題，華中又涉及戰爭，如江蘇、安徽、湖北等已經在戰爭氣氛中，現在祇有華南，可是華南又鬧着水災匪災，良民都不能留居，奔向都市裡來，農村漸至破產，工廠又設立很少，糧食、棉布、工業原料都在大缺乏中，一切待候美援，生產怎樣可能。生產既不可能，物資當然缺乏，漲價自然會發生，這樣，物價要漲，通貨難免膨脹，財政收支不能平衡，改革幣制的神，最後還是狂費的。

★ 我說幣制改革是狂費，其實政府並非不知道這點，它又有一種用意在這，就是它要沒收民間所有黃金、美鈔、白銀等，好作政府另外一筆很苦痛的××支銷。老實說，被沒收倒是這批小本買賣的可憐蟲，擁有大量黃金美鈔白銀的巨商富翁，他們是不會隨便上政府的當，坐在家裡，正在瞧着這齣滑稽的把戲！

★ 的確，多袖手旁觀一些時候，纔對自己有利，那一個巨商富翁不是這樣的想，祇有白癡或傻瓜才不會這樣的打算。

呂克難：照我個人看法，幣改成功的可能太少。其故：（一）表面

視之，似乎經濟問題可與政治問題分家，實際則是難分難解。要幣改成功，必須人民與當局利害打成一片。就浮面看，好像人民希望物價穩定，以求生活有着，極願與政府的「限價」，統制運銷諸政策配合。但這是極其有限的，一旦觸及豪門的利益，立刻辦不通。政府不肯拿豪門來犧牲，看這次對黃金、美鈔持有者優容可知。（二）歷史上從來沒有證明這樣一種事實：以如此脆弱（一味仰賴外援）的經濟基礎實行幣改而成功的；同時也沒有證明過靠政治壓力可以解決經濟問題的。蘇聯是前車之鑒。（三）政府這次實行幣改，窺其意向，一個「拖」字而已。此中無社會改革的意義，無改善人民生活的意義，幣改與搜捕反政府現狀學生同時進行，可知其精神所在；為「戡亂」非為「建國」也。其目的在熬過今冬，以為共和黨上台大舉援華的張本，如此而已。

固然，這不失為一貼定心劑，至少也可安定一個時候，但不會太長久的。我認為，幣改要真正成功，除非停止內戰，走和平的路。

我說的純屬外行話，但今天的中國，老實說一句，就種在專家們手裡，總是實討論着一些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問題。

莊湘波：木已成舟的幣制改革，我們無法再考慮其是非了，惟希政府能澈底保持新幣制的信用，不要再與過去的幣制一樣弄至破產，祇要做到這一步，則不辜負人民對於新幣制的擁護的期望了，茲對新幣有數點意見貢獻如后：

（一）嗣後金圓券發行的數目：要絕對公開。過去法幣發行是很秘密的，人民對舊法幣抵抗方法祇有抬高物價，物價愈高，貨幣愈發，貨幣愈發，物價愈高，弄到整個國民經濟幾乎陷於破產狀態中，現在，政府為了要掃除過去病端，昭明信用，特地設立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專司檢查金

圓券發行的數目，並公開之，這是一種善良的制度，希望政府能切實做到這點。

（二）充實準備金是發行金圓券最基本要件。今日政府既有少數準備金，並擬出售國營事業股票及發行金圓公債，來彌補其所短少的數目，但此外如日本賠償物資，敵偽產業，美援物資等，亦應從速拋售，以整準備金的不足。

（三）內戰在延續中，一切消費浩大，若不加緊增加生產，其前途的演變必很悲觀，所以對於生產的一點，如整頓農村、普及工廠、開闢礦產等均為增加國家財富的有效辦法，至於發展這些生產事業，即吸收或鼓勵游資走上此途，游資能否走上此途，就要看以後物價能否穩定，祇要政府把持物價的穩定，游資自然不敢作祟，並可走上正道的。

上述諸點，祇是片面觀感，最重要還在政府自己的努力，及遵守自己的諾言，如果政府不這樣的做，就是最有最好的辦法，亦無用處。

陳述昆：在經濟形勢將崩潰之前夕，政府毅然改革幣制，不失為賢明而必要的舉動，為希望達到改革目的，不踏過去虎頭蛇尾的習氣，雷厲風行，執法如山，也是應有的手段，我們非常擁護與同情。

但是，執行限價，制止囤積，不過為治標政策，以外力迫使人民奉行法令，重視幣制，尙未達衷心信用的階段，僅是初步的辦法，鄙人認為要改革後幣制之穩定，必須進一步從治本方面着手，使人民真正信任金圓券的價值，完全改變過去「重物輕幣」的心理，方是改革幣制的大成。

治本方法，不外二種：一為增加生產，一為節約消費。

增加生產，足以使社會供求相應，物資不發生缺乏的現象，即能消滅抬高物價囤積居奇的因素，要增加生產，必須扶植工商業處於活潑，引導游資，納於投資，工商發達，生產自多，人民無從居奇，何用囤積，物價亦不會發生強烈的波動而趨於安定。

節制消費是減少物資逐趨缺乏的最好方法，我國經八載抗戰，三載兵亂，物資形成極度恐慌，「物以稀為貴」，實為經濟之常理，苟能節約不必要的消費，緩和物資缺乏的險象，一面增加生產，更容易使經濟安定。

總之，幣制的所以必需改革，全在過去法幣的失信于民，應歸根政府對於上述兩種方法，未能澈底做到，專靠增加發行通貨，來彌補國庫的不足，今後財政當局，絕對不能仍蹈以前覆轍，增加發行，只能以增加及整頓稅收，來彌補赤字，縱有不足或臨時需要，儘可變賣國有資產，及發行公債等方法，否則，換湯不換藥，政府再度失信，病入膏肓，無可救藥矣。

我的結論，改革幣制的成功，技術上賴於「限制發行」，「建立幣信」，而經濟的久恒安定，則須在「增加生產」「節約消費」方面去實行。

★ ★ ★ ★ ★

金柏生：政府於八月二十日宣佈改革幣制，發行金圓券，金銀及外國幣禁止流通買賣或持有，中外人仕對政府毅然改革幣制，毀譽參半。前者因對於幣制改革後，收支尚難平衡及共匪猖獗，軍事費用浩大，竟佔預算百分之八十強，收最近報載預算收支，相差尚達十二億五千二百五十萬金圓之鉅，倘戰事蔓延，勢必重蹈法幣之覆轍。幸當局對於物價波動防止周密，且蔣督導員林金管局長暨宣司令三氏均以公正鉄腕著稱。故自總統頒令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以還，表面上物價均能站停於八月十九日最高價；但因少數富有者之缺乏國家觀念，依舊搜羅囤積居奇，或持貨觀望，致弄成有行無市，急需者不得不出黑市搜求，因致一班平民受害最烈。例如西藥中之配尼西靈及肺病特效藥，市上貨色原來甚多，但近已絕跡，病人無法購買，不得不出高價向黑市購買，開定價二元五角，黑市在四元六角左右，無形之中已漲百分之八十，其他如紗布及日用品莫不相繼高翔，總之，人民對於幣制之信仰不堅，物價則終難穩定。後者稱譽政府改革幣制可稱成功，因

此次發行金圓券，具有十足準備，百分之四十為金銀及外匯，其餘百分之六十有國營招商局及中紡紗廠財產，故與法幣截然不同，加以政府考慮周詳。平衡收支方面規定四個有效辦法：

(甲)切實增進各種稅收。

(乙)調整國營公用及交通事業之收費低於戰前標準者。

(丙)節省浪費、裁汰冗員。

(丁)盡量加速出售剩餘及接收敵偽物資。

以上四端，確為平衡收支之有效良劑，但此種措置祇能治標，恐難持久。爰就管見所及「如何求得幣制改革後幣值之穩定」略述於后：

夫物價之漲落與幣值之穩定，雖息息相關，但幣值與物價漲落不能并為一談，以物價之漲落根據經濟學原理，其原因不外乎供給與需要之多寡 (Supply and Demand)。倘某一種貨物供給多，而需要少，則其價必落反之，則必上漲。譬如八一五和平後，國人向美國定購汽車，但美國從戰事停止後，所有工廠不能於短時期恢復大量製造汽車，即有少數生產，其國內需炬亦多，故輸出者甚少，於是第一輛克雷斯勒汽車到上海，某西人定價祇美金三千七百五十元，被豪富出美金一萬三千元之代價買去，較原價增百分之二百四十有強，此非幣值之跌落，乃供求不相稱之原因。上年正月別克汽車到滬有四十輛之多，每輛均在美金一萬一千至一萬二千元之間售去，嗣後因汽油漲價，當局欲限制使用汽車，而美國各種汽車到貨仍暢，時至今日，不過一年有半，而汽車價格慘跌甚鉅，最新別克汽車每輛約值美金五千元，足證物價之暴漲暴落，其前因後果亦有與幣值毫無關係者。故竊以為欲求幣值之穩定，首先需得國民之信仰，在國人對於新幣制之信仰尚未堅定之時，政府應設法排除足以影響物價上漲之因素，及謀改善辦法，如能依照下列辦法切實施行，則幣制改革後之幣值當可穩定。

(一) 戡定內亂改善交通

連年內亂，戰費大量支出，且兵刃所及，破壞殆盡，人民流離失所，

國庫收支不能平衡，遂不得不乞鑄於紙幣之發行，發行增加，幣值跌落，物價隨之上漲，勢所必然。故早日平定內亂，為穩定幣值之要素；改善交通使物資交流，以甲地之有易乙地之無，供求相稱，無奇貨可居之弊竇，則物價既少波動，幣值自趨穩定。

(二) 疏導游資投資生產

自黃金白銀及外匯兌換以來，游資充塞，若不疏導納入正軌，則必走入歧途，從事於投機囤貨，促成物價暴漲，影響經濟民生至深且鉅，必使投資於生產事業，始為游資之正當歸宿。

(三) 增加生產節制糜費

我國以農立國，但最可恥者食米尚需購大量洋米，以資調節，致肥沃

讀史劄記

論元代覆亡之速

· 訥庵 ·

前記元季崇信番僧，荒淫無道，政事廢弛，遠燕京不守，而主中夏之局以亡，固矣；然其所以享國短促之故，則尚有說。元世祖初得天下，如文信國(天祥)謝疊山(昉得)者，不為威脅祿誘，百折不回，以死殉節，乃知漢人之不易駕馭，南人之尤不歸附。而於用人之標準，猶顯分等級，(蒙古人為首，色目人次之，漢人南人又次之，見前「元代輕儒」所記)人心益為不平，復用極端統治政策，設置屯田千戶、百戶等官，以蒙古軍人充任之，在其所管轄區內，騷擾需索，任意凌踐，甚至十戶始許共置一刀，供割烹之用(其法竟與法人之統治越南略合)，以為如此制防，天下可晏然無事矣，然以力服人，決難持久，卒之民心怨憤，羣謀反抗，若宋元璋(明太祖)、方國珍、徐壽輝、陳友諒、張士誠諸人，於其初起之時，類皆無所憑藉，乃奮臂一呼，萬民響應，軍靡所至，從者如雲，十餘載而逐元君於塞外，固不必有堅甲利兵，而亦可成事也。昔嘗讀賈誼過秦論有曰：「陳涉，甕糶糲糠之子，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而偶起什伯之中，(選本作俛起阡陌之中，此從史

之土地，變成荒蕪。若能改良工具，開闢荒蕪，化兵為農，化農為工，增加生產，物資充裕，則幣值當可穩定，此就積極方面而言；至消極方面，對大都市之紙醉金迷，一擲千金，節此無謂之糜費，作有用之投資，直接間接均有補助於穩定幣值。

(四) 拋售物資獎勵出口

不法商人囤積大量物資，政府應檢查倉庫，查封物資，盡量拋售，藉以收銷通貨。同時獎勵出口，爭取外匯，務使國際收支平衡，則幣值可屹立不變。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金亦逐漸貶值，以我國脆弱之經濟，能若英美各國慢性貶值，不若法幣之惡性膨脹，則此次幣制之改革，可稱為成功矣！一得之愚，質之明達，未識以為然否。

記。)將數百之衆，斬木為兵，揭竿為旂，天下雲集響應，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於以知秦元之所以速亡者，力之不足恃，而德之不遠民，誠有如白香山詩所謂「以德感人人心歸」，為古今治國探本之要道也。予又嘗考清代駐防之制，於平定三藩(吳三桂、尙之信、耿精忠。)之後，凡西安、荊州、江寧、京口、以至蜀、粵、閩、浙重要之區，皆設置旗營，築城鎮守，而以將軍、副都統領之。將軍品位班行，在總督上，惟以清代定制之善，並不干涉行政，地方之綠營兵，則歸督撫統轄(盛京及吉、黑則建置特殊；熱、察、綏則兼轄蒙旗；伊犁、審夏則控制邊疆；其鎮守之將軍、都統兼理軍民，職任皆重，又與內地之駐防不同。)，二百餘年，相安無事，及洪楊亂起，昔之所稱八旗勁旅者，已不可復用，乃倚任湘淮各軍，以削平大難，軍事既定，固無再以旗營設防之必要矣。而廷議孑於舊制，於已失守如江寧、京口、杭州等處，仍恢復駐防，惟舊有旗兵，所存無幾，京旗習於惰靡，又多不願遠調，則於其他駐防內調撥而補充之，其將軍副都統之人選，復不視為重要，而膺斯任者，且以投閒置散自居，國初建置之本意，久已名存而實亡，豈真「有其舉之，莫敢廢焉」也耶？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信託外匯倉庫

總行：上海弄波路五〇號 電話二二五六〇
本埠分行：南京西路 林森中路 愚園路 八仙橋 虹口

外埠分支行處：
 提籃橋 徐家匯
 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廣西 長沙 南昌 漢口 武昌 蕪湖
 南京 鎮江 常州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蚌埠

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

交通銀行

(業務網要)

存款匯兌
放款貼現
儲蓄儲券
信託保險
倉庫運輸
實業投資

分支行處遍設國內外各埠共二百餘處

總管理處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
電話掛號九八〇一
電話一五五三六四七

上海分行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
電話掛號大五二〇七
電話一三五〇四七
轉接各部

信託部

上海九江路六十九號
電話一〇八二八
電話一四六四九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一二五九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川東郵政管理執照第七〇七號

本刊訂閱價目表

附註	國內		國外	
	航空掛號	掛號	航空掛號	掛號
一 郵資五分以上實足計算 二 郵資增價謹請照補	期數	十三個月	期數	十三個月
	廿半年	廿半年	廿半年	廿半年
	四期年	四期年	四期年	四期年
	全十八期年	全十八期年	全十八期年	全十八期年
	一元二角	一元四角	二元二角	二元四角
	二元一角	二元七角	三元四角	三元六角
	二元二角	三元二角	四元二角	四元四角
	二元八角	三元八角	五元八角	六元八角
	三元八角	四元八角	六元八角	七元八角

本刊經銷處：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山東路中保坊二一五號
上海聯合書報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